

多变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崛起

Jane Golley 宋立刚

20 世纪的后 30 年见证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崛起，而 21 世纪的前 30 年毫无疑问将是中国完成它崛起的最佳时期。中国的崛起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目前，根据国民账户来衡量，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朝着世界第一经济体迈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在确保世界经济始终保持增长的努力中，中国国内经济的强劲增长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将全球 1/5 的人口带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这将全球市场潜力和一体化程度提高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而由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带来的规模更大和深度更广的国际分工则为促进世界生产、工业和消费以及提高各国福利水平提供了新的机遇。

尽管中国经济的崛起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巨大的全球和国家利益，但同时它也引起了不少问题。中国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迫使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重新分配。这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和政治关系上的摩擦不断增加，并引起了一些全球性的、关键的外部效应，具体如下。

第一，日趋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来自于中国的低成本产品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上“中国制造”产品份额的提高。

第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不平衡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不断上涨的商品价格，包括能源和矿石的价格。而中国对自然资

源需求的急剧增加是导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中国需要这些自然资源来实现其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四，日益增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来自于中国高速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Song, 2010)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不断提高不仅影响着它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版图。正如 Findlay 和 O'Rourke (2007: 545) 所指出的那样，“从长远看，作为主要的政治经济超级大国，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不仅有利于全人类福利的提高，也是对不可预测的区域政治多样性的保证”。无论这些挑战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中国都将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将其崛起控制在一个让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都普遍接受的水平。与之对应的就是国际社会必须顺应中国崛起的空间以确保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社会在 21 世纪的前半段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如何适应中国崛起。

地区之间出现严重的贸易和金融失衡是最近几年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实体经济中，中美之间日趋扩大的贸易失衡成为了主要的影响因素。中国之所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于它的实体经济，它的出口份额、贸易、碳排放量和商品消费量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和外汇安排结构阻止了它在金融领域内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中国仍在以工业化国家的标准金融系统为标准来调整实体经济失衡的现象。为了修正失衡，中国需要加深金融体系改革，为开放资本账户和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铺平道路。

为了解决这种失衡的状况，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必须寻求他们经济活动构成的改变，以最后改变其资产负债表。我们在金融危机中所经历的因金融去杠杆加速而引起的全球性的创伤和在金融危机之后所观察到的不稳定的现象并不能减轻这项任务的困难度。

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坚持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在下一波高速增长时，它就需要将重心放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向国内市场的转移，增长重心由沿海向内地的转移，加大服务业的扩张，以及提高中小型有优势的私企的活力上 (Overholt, 2010)。虽然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尚需时日，但一些清晰的改革选项将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以及为数众多的农民工的城市化。中国也可以通过减少出口，提高进口来调整失衡局面。

朝着一个市场导向的汇率制度发展是解决失衡问题的结构性方法。

考虑到中国规模庞大的经济以及它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几乎中国进行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应该如何最好地管理它巨额的美元资产，从而保证这些资产不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呢？一方面，美元贬值实际上造成美国出口增多、进口减少，由此改善了它贸易账户的平衡。另一方面，美元贬值也造成美国资产增值，与之相对则是世界其他国家资产的贬值（Serren 和 Nguyen，2010：7）。这对于中国所囤积的大量跨境资产和它持续推进的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金融风险。鉴于此，中国跨境资产的多样化——减少美元资产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发行的短期资产的持有量，就显得十分适当而且不可避免。这是该金融全球化模式的一部分，它通常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有时也会造成消极影响。此外，这也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Truman，2008：178）。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如何去做，它都会加速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从而增添美国提高利率的压力。但这对于正在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考虑的。现如今，中美这两个主要经济强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都表明合作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在许多方面，全球均是如此。

为了更好地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寻找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方案，以改变现时起主导作用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得十分迫切。这是因为维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平的、多边的政治、贸易和金融体系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促使新兴国家遵守规则，同时那些发达国家会更加适应及合作。在一个中国急切想发挥领导地位的世界里，这个多边的框架将为国际贸易的扩张提供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它将使国际贸易持续成为一个正和游戏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直到那时，全球共同的目标——比如保持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实现金融一体化、消除贫困、改变气候剧变的局面以及改善地区和国际的安全，才能够成功实现（Song，2010）。

本书的各章主要分析上述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对中国崛起背景下所出现的机遇和挑战的思考和分析。有一些章节主要集中讨论关键的双边关系（包括中美关系和中澳关系）。一些章节则关注国家对比方面（比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移民对比以及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来源的对比），或从中国视

角来审视的全球目标（比如限制气候剧变和改革国际经济体系）。一些章节还关注特定市场（比如石油市场），一些章节则重点关注关键的内部问题（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或者中国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某些方面（比如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尽管所涉及的话题和方法范围很广，但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发生在一个多变的世界格局下，而且它同时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国际经济学家 Mckay 着手在第二章评估了在过去 5 年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表现。Mckay 证明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如何受到平衡国有和私有经济活动努力的影响，他认为这是追踪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在研究中国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政策之前，他以最新的房地产数据和基础设施活动为跳板来分别考察私有和国有经济运营。在中国的不定期政策支撑着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之下，挑战在于，如何在不进一步恶化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下，找到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却又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方法。

伴随着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崛起，普遍的舆论认为，当前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改革。该体系的特征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居于核心地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几乎没有观点来表述这项改革将何去何从。黄益平、党韦华和王姣将这作为他们在第三章的开篇论点，这些论点从中国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分析从一个问题开始——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接下来就是对中美两国集团（G2）、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所扮演角色的思考，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需求和最佳的全球储备体系的思考。在作者们最后的结论中，他们具体阐述了中国想要什么，中国能提供什么和中国在塑造和谐、合作和稳定的国际新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从 2008 年以来，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人民币（RMB）的国际地位。在第四章里，Yin-Wong Cheung、马国南和 Robert McCauley 对这些举措作了具体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中期策略的一部分，这个策略目的在于将一些中国的国际人民币债务作为一个分摊中国国际资产负债表的外汇风险的方法。然而，他们也承认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存在诸多限制——包括激烈争论的人民币币值被低估问题和对人民币—美元关系的误解。这一章节在

本质上对未来中国及其贸易伙伴能够标示出一些潜藏在人民币中的风险是持乐观态度的。

在第五章里，李坤望和宋立刚参加了关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是否同它当前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辩论。他们不同意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出口质量方面有着非凡的表现，且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提高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李和宋对中国在国际零散化生产流程中的角色进行了调查，并认为这个观点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质量，因为该观点将中国的进口产品和零部件中所包含的外国科技也列为中国科技。他们的数据表明，恰恰相反，中国在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方面表现不佳。李和宋呼吁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采取适当政策，加速攀登全球技术的阶梯。

若一本关于中国崛起对全球影响的书没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章节，那它就是不完整的。中国在过去 30 年中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将近 1 万亿美元。在第六章里，陈春来提供了一项最新的中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态度的变迁分析——从严格限制到被动吸引，然后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引进外资，这些都反映在中国外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演变中。尽管中国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投资方面的规则上有了明显进步，但陈呼吁中国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的透明度、国民待遇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尽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确保外资政策同国内的发展目标一致，但是为外国和国内的公司提供平等的鼓励措施和竞争机会，以及更强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对于维持中国在未来作为一个全球性有竞争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在第七章中，王碧珺和王辉耀研究了最近的现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这从 2004 年就处于激增状态，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五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两位专家着眼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他们认为，这些企业所处的现代全球化环境同几十年前面对跨国公司（MNCs）的世界环境有本质区别。同样的，他们的动机和竞争优势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大部分中国企业寻求先进技术而不是廉价劳动力。而且，在中央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他们还有大量优惠政策的支持。这些（往往不透明）的政府支持导致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时遇到了一个相当独特的问题——如何让东道国的政党、游说团体、竞争对手、社团和新闻媒体不用担心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投资。

Andrew Kennedy 在第八章讨论了中国的石油困境，强调中国（引申到

全世界)在探索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着挑战和机遇。虽然中国领导人清晰地认识到必须妥善处理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可避免的提高的问题,但 Kennedy 认为现在所采取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政策仅仅是中国单方面努力去提高国内石油生产能力以及同产油国签订双边供油协议。他呼吁中国应当同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特别是国际能源署进行更多多边接触。这不仅仅会增强全球石油安全前景,而且对于其他参与国来说,在处理中国崛起问题上,是一个释放出合作态势的良机。

张永生在第九章里提到了 21 世纪全球最大的问题——防止全球气候剧变。张说,要想达到在 2050 年控制全球气温仅仅上升 2℃ 的长期目标,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保持全球碳平衡和实现低碳增长。第一个条件希望工业化国家对他们的历史排放量负起责任,这些碳物质至今仍存留于大气层中,从而限制了欠发达国家用于发展所必需的碳排放空间。通过将这些历史排放量合并到各国所分摊到的人均碳排放量,张发现工业化国家累积了严重的碳排放赤字,如果他们肯承认的话,这将为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变——朝着低碳增长发展,提供激励。尽管他对防止全球气候剧变的谈判达成协议持悲观态度,但他看好中国在促进巨变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实现意义最为深远的发展模式转变的最好时机。

Geoffrey Garrett 和胡永泰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分别为我们展现了中美关系——全球舞台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的演变情况。Garrett 展示了一个非常均衡的评估报告,该评估认为尽管美国将陷入相对经济衰退期(不同于亚洲的剧烈衰退),但美国仍在文化和政治上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加勒特认为中美关系的产物——好的话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坏的话会导致武装冲突所产生的损失应该能给我们信心,确保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能够继续有效地处理好双方的关系。他注意到,两国之间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在国内,而并非是关注双边关系本身——这点上胡永泰提出尤其要改善双边贸易失衡。Garrett 乐观地认为,崛起势力面对衰退势力的摩擦是能通过双方提升的外交技巧解决的,这从他们最近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方法能看出来。胡同样希望开明的自身利益能够引导美国和中国认真地缓和他们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张程度。

在第十二章里,Christopher Findlay 审视了澳中经济关系。Findlay 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证据证明这个关系正在朝着更为紧密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现

在不仅仅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是最大的留学生源地和旅客源地（两个关键的服务出口行业），还是重要性与日俱增的自然资源行业的投资来源，而自然资源行业是近几十年内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支柱。Findlay 明确表示，这个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并非没有挑战，他把这种挑战分成 3 组：“现时”的挑战，“繁荣结束时”的挑战和“抓住新机会”的挑战。他的结论表明，澳大利亚必须实施一系列政策和体制改革，这样它在未来才能继续从同中国的交往中获利。相关改革包括资源税、移民、签证和航空服务，劳动生产力和灵活性，以及持续减少贸易壁垒。

除了非洲所获得的中国援助在近几年激增这个共识外，舆论再也没有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共识。Deborah Brautigam 在第十三章中对这个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提供了中国在非洲进行“发展援助”之构成的清晰调查结果。包括这个项目将如何发展，项目的数量，以及其背后的动机和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调查，她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用于援助非洲官方的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中，仅有少部分能被列为政府开发援助（ODA）。理会了中国在非洲进行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的真正目的（大部分并非援助），是了解围绕中国与非洲接触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不仅对于非洲国家本身如此，对于非洲的传统合作伙伴和中国本身来说，亦是如此。

Peter Robertson 在第十四章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对现在和未来两位“泰坦巨人”——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Robertson 利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证明了与广泛持有的观点相反，中国在过去 30 年中非凡的增长业绩与其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有关程度可能要大于与其实物资本存量增长的有关程度。他的估算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是迄今为止两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特别是中国，能取得意义深远的成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拥有中学和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不断增长。对于两国来说，最关键的挑战落在确保他们庞大的人口——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能够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这将是未来几十年中两位“泰坦巨人”获得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在第十五章里，Paul Frijters、孟昕和 Budy Resosudarmo 提供了一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对比分析。两国的上百万的流动人口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尤其调查了中国和印尼不同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乡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尽管两国城市化进

程在迅速推进，但中国城市却严格限制流动人口从事高收入的职业，而印尼的城市则更为自由放任。他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流动人口所挣的钱比当地的城市居民要少得多。而印尼的流动人口所挣的钱却稍微多一些，这种差异突显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对城市中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对于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政府消除收入不平等的承诺来说，这是一个越发紧要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 30 年中显著提高经济实力，伴随着，实际上，或者说在某些方面，是由最迅速的“人口结构的转型”所引起的。这一转型规模在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第十六章中，赵中维从全球视角分析了这种转型，发现了一些中国正在面临的关键挑战，这些挑战随着中国在致富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产生。他证明道，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不大可能对未来的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赵呼吁中国政府谨慎地评估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的长期影响，以及需用适当的政策来回应。若要准备好面对即将来临的挑战，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改善人口统计数据采集的方法和质量。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那就无法得知中国人口转型将何去何从，而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则更是无从谈起。

在第十七章中，都阳和王美艳对中国其中一项关键的人口挑战——人口老龄化以及它未来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作了更深入的研究。都和王的研究表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由于它所拥有的资源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所需，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保险金制度和不完备的医疗教育体系，因此中国人在一生中的消费选择是十分复杂的。他们绘制了一个最新城市家庭调查表（问卷表）来调查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消费之间的联系——即了解在中国提高国内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的大背景下，对于实现中国这个首要目标来说，什么是尤其重要的。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医疗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会成为促进消费的最大障碍。

最后，在第十八章中，王小鲁从国际视角调查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他沿用由来已久的辩论，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城市战略是应该更多关注中小城市及村镇的发展还是允许并鼓励更多特大城市的出现。他使用跨国的数据进行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中国住在特大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普通水平，并且暗示，在未来 20 年内，额外的 2.3 亿人应该迁往特大

城市。在围绕中国发展进程所产生的问题中，庞大的人口绝对数量将带来最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Cooper, N. R. (2008), “Global Imbalances: Globalisation, Dem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2, no. 3, pp. 93 – 112.

Findlay, R. and O'Rourke, K. H. (2007), *Power and Plenty: Tra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UK.

McKay, H. and Song, L. (2010), “China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1 (February), pp. 1 – 32.

Overholt, W. H. (2010), “China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Rising Influence, Rising Challeng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1, pp. 21 – 34.

Serven, L. and Nguyen, H. (2010), *Global Imbala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Policy Research Paper 5354,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ong, L. (2010), *China's Rapi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Presented at the Thirty-Fourth PAFTAD Conference o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7 – 9 December 2010,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Truman, E. M. (2008), “The Manag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erves: China and a Sovereign Fund Scoreboard”, in M. Goldstein and N. R. Lardy (eds), *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pp. 169 – 93.

(黎建良 译)